

〔法〕朗格诺瓦 瑟诺博司／原著
李思纯 何炳松／选译 李孝迁 胡昌智／编校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SHING FUND PROJECT

历史研究法二种合刊

史学研究法未刊讲义四种

中国现代史学评论

现代大学史学系概览（1912—1949）

中国史学史未刊讲义四种

近代中国史家学记

史学方法论

历史研究法二种合刊

英国文化史

陈漱江史学论文集

刘掞藜史学论著集

中国古代史学评论

京师大学堂历史讲义合刊

近代中国学者论日本汉学

历史综合法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中国近代史学文献丛刊
王东 李孝迁／主编

历史研究法二种合刊

上海古籍出版社

〔法〕朗格诺瓦 瑟诺博司／原著

李思纯 何炳松／选译
李孝迁 胡昌智／编校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历史研究法二种合刊 / (法) 朗格诺瓦, (法) 瑟诺
博司原著; 李思纯, 何炳松选译; 李孝迁, 胡昌智编校
.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8. 11
(中国近代史学文献丛刊)
ISBN 978-7-5325-9000-1

I. ①历… II. ①朗… ②瑟… ③李… ④何… ⑤李… ⑥胡… III. ①历史—研究方法 IV. ①K0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231895 号

中国近代史学文献丛刊

历史研究法二种合刊

[法] 朗格诺瓦 瑟诺博司 原著

李思纯 何炳松 选译

李孝迁 胡昌智 编校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邮政编码 200020)

(1) 网址: www.guji.com.cn

(2) E-mail: guji1@guji.com.cn

(3) 易文网网址: www.ewen.co

浙江新华数码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635×965 1/16 印张 22.75 插页 6 字数 250,000

2018 年 11 月第 1 版 201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5-9000-1

K · 2561 定价: 92.00 元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公司联系

2018 年度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

上海高校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出版工程

上海市教育委员会科研创新计划重大项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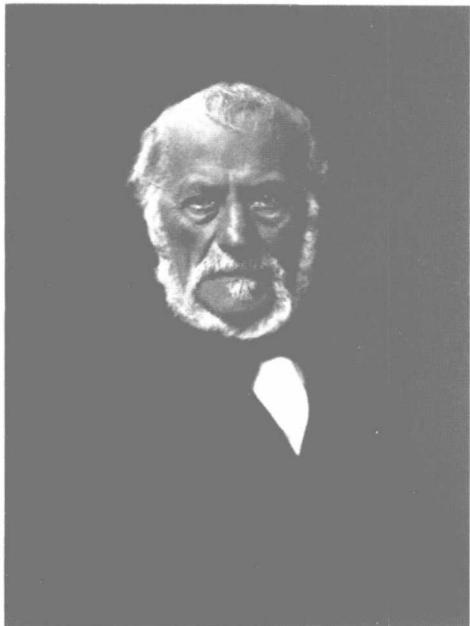
“重构中国：中国现代史学的知识谱系（1901—1949）”

（2017-01-07-00-05-E0002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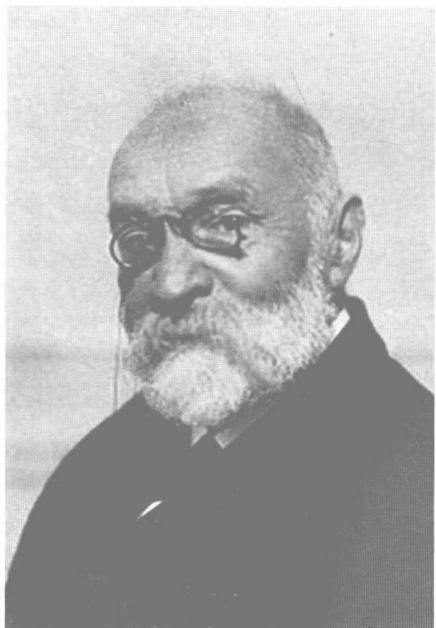
2018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域外史学在华百年传播史（多卷本）”

（项目批准号 18ZDA214）



Ch.V.Langlois (1863-1929)



Ch.Seignobos (1854-1942)

丛刊缘起

学术的发展离不开新史料、新视野和新方法，而新史料则尤为关键。就史学而言，世人尝谓无史料便无史学。王国维曾说：“古来新学问之起，大都由于新发现。”无独有偶，陈寅恪亦以为“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顺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否则谓之未入流。王、陈二氏所言，实为至论。抚今追昔，中国史学之发达，每每与新史料的发现有着内在联系。举凡学术领域之开拓、学术热点之生成，乃至学术风气之转移、研究方法之创新，往往均缘起于新史料之发现。职是之故，丛刊之编辑，即旨在为中国近代史学史学科向纵深推进，提供丰富的史料支持。

当下的数字化技术为发掘新史料提供了捷径。晚近以来大量文献数据库的推陈出新，中西文报刊图书资料的影印和数字化，各地图书馆、档案馆开放程度的提高，近代学人文集、书信、日记不断影印整理出版，凡此种种，都注定这个时代将是一个史料大发现的时代。我们有幸处在一个图书资讯极度发达的年代，当不负时代赋予我们的绝好机遇，做出更好的研究业绩。

以往研究中国近代史学，大多关注史家生平及其著作，所用材料以正式出版的书籍和期刊文献为主，研究主题和视野均有很大的局限。如果放宽学术视野，把史学作为整个社会、政治、思潮的有机组成部分，互相联络，那么研究中国近代史学所凭借的资料将甚为丰富，且对其他也有更为立体动态的观察，而不仅就史论史。令人遗憾的是，近代史学文献资料尚未有系统全面的搜集和整理，从而成为学科发展的瓶颈之一。适值数字化时代，我们有志于从事这项为人作嫁衣裳的事业，推出《中国近代史学文献丛刊》，计划陆续出版各种文献资料，以飨学界同仁。

丛刊收录文献的原则：其一“详人所略，略人所详”，丛刊以发掘新史料为主，尤其是中西文报刊以及档案资料；其二“应有尽有，应无尽无”，丛刊并非常见文献的大杂烩，在文献搜集的广度和深度上，力求涸泽而渔，为研究者提供一份全新的资料，使之具有长久的学术价值。我们立志让丛刊成为相关研究者的案头必备。

这项资料整理工作，涉及面极广，非凭一手一足之力，亦非一朝一夕之功，便可期而成，必待众缘，发挥集体作业的优势，方能集腋成裘，形成规模。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在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领域有着长久深厚的学术传统，素为海内外所共识。我们有责任，也有雄心和耐心为本学科的发展贡献绵薄之力。在当下的学术评价机制中，这些努力或许不被认可，然为学术自身计，不较一时得失，同仁仍勉力为之。

欢迎学界同道的批评！

《史学原论》及其在中国的接受

——代前言

全球历史学的专业化过程中,1897年法国朗格诺瓦(Ch. V. Langlois, 1863—1929)、瑟诺博司(Ch. Seignobos, 1854—1942)合著的《史学原论》,^①风行欧美,被誉为“英文中讨论史法之唯一名著”,^②译介到世界各地,对各国史学专业化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此书三百余页,简要阐述治史之步骤,使治史者有法可依,不仅是“法国几代学生学习史学方法的标准教材”,^③而且在中国风行了近半个世纪。*Introduction* 所立下的规则,沉淀在专业史家的日常实践,构成了中国现代史学的方法论基础。不论国际学术界还是中文世界,既有研究对此书关注很不够。本文拟对此书的写作缘起、史学思想及其在中国的影响,作深入全面的探讨。首先尝试说明 *Introduction* 与时代需求的关联性。以瑟诺博司的生平为主轴,叙述法国在普法战争之后以教育革新强化国力的作为。在瑟氏积极参与的历史教育制度改革中,出现了历史方法学的需求, *Introduction* 是配合他推动制度改革而产生的著作;其次分析 *Introduction* 史学思想特色,将从四个方面说明:(一)以人物解释社会结构演变,(二)怀疑精神与对社会科学的态度,(三)历史学的主观性与科学性,(四)实证主义与非实证主义之间的史学思想;最后,钩沉相关史料,集腋成裘,以期说明此书在民国史学界

* 本文第一、二节由德国华裔学者胡昌智教授执笔,第三节由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李孝迁教授执笔。

① 法文书名 *Introduction aux Etudes Historiques*, 1898 年 G. G. Berry 译成英文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History*, 下文简称 *Introduction*。中译本书名《史学原论》, 系李思纯译, 今从旧。本文引用的译本是余伟的新译本《史学原论》(大象出版社, 2010 年), 下文简称“余伟译本”。

② 何炳松:《历史研究法·编者导言》,商务印书馆,1928年,第8页。

③ 伊格尔斯著,赵世玲等译:《欧洲史学新方向》,华夏出版社,1989年,第52页。

被接受与拒斥的具体情形。

一、成书缘起

Introduction 作者之一瑟诺博司 1854 年出生在法国南部阿迭协河域一个小镇。^① 理性的休京诺(Huguenot)基督新教背景,加上父亲从政所持的中间偏左的政治立场,塑造了瑟氏一生思想活泼、据理力争、好辩的个性。十九岁时他先进入巴黎大学法律系,一年后 1874 年转到高等师范学院(École normale supérieure)历史系。^② 在高等师范学院他跟随两位老师:古朗士(Numa Denis Fustel de Coulanges, 1830 – 1889)和拉威瑟(Ernest Lavisse, 1842 – 1922)。前者在智性上终身引导着、挑战着他,后者赋予他现实社会中的使命,携手共创事业。

个性羞涩的古朗士也出身于高等师范学院,不满六十年的生命,却成为学术界下一代的导师。^③ 他的崇高的地位不是因为曾经担任高等师范学院院长而获得。他精神上领袖的地位来自他面对学术的观念、严谨、原则与纪律。他为史学耗尽一生心血,所留下未竟的作品,成为学术的典范。^④ 古朗士没有方法学及理论的著作,所有典范性的概念与方法都落实在他的作品,偶尔也散见在著作的反思部分,譬如序文或导论。

古朗士的博士论文《古代城市》(1864)承续着孟德斯鸠对风俗、制度的研究传统。他的研究始于怀疑,书本上习以为常的说法都在他质疑之列,譬如“罗马人发明民法”。他自问既然罗马人有民法的需求,难道在他们之前的人们以及其他城市的人们没有类似的需求以及相关的

① 1987 年荷兰来登大学伯尔(Pim Den Boer)的博士论文 *Geschiedenis als beroep. De professionalisering van de geschiedbeoefening in Frankrijk 1818 – 1914*。Arnold J. Pomerans 翻译该书为英文 *History as a Profession: The Study of History in France 1818 – 1914*, Princeton, 1998。下文简称“Pomerans 译著”。其中有瑟诺博司传六页(第 295—300 页),该传记以法国十九世纪历史教育为背景。

② 高等师范学院是法国大学之外的菁英高等教育机构之一,当时每年仅收二十名学生。

③ 古朗士的传,参见 Tourneur-Aumont, J. M., *Fustel de Coulanges, 1830 – 1889*, Paris, 1931, 瑟诺博司撰写序言。中文方面,李璜《法兰西近代历史学》(《少年中国》1921 年第 3 卷第 6 期,第 1—12 页)对古朗士有所介绍。

④ 李璜在 1921 年说:“在今(法国)历史学界里,也是他的势力最大。”李璜上引文,第 10 页。

规定吗？对他而言，法律及政治制度都是人们内心道德与秩序需求的落实，而道德需求也植根于宗教，并藉宗教仪式与节庆活动表达出来。若要了解罗马人的民法，研究者必须追溯回到他们的宗教、风俗以及之前希腊人的习俗，并且从原始文献中察看它们的关系及演变过程。他以宗教、风俗、法律、政治制度等整体社会行为观察古代城市，而且是以长时段的观点、以把时间拉长的方式观察它们。^①

在《古代城市》里，他表现出的对历史研究对象以及历史研究方法清晰的信念，也贯穿于他晚期的著作。1875年《罗马的高卢》是他成名的经典作品，它是古朗士构想中《古代法国政治制度史》系列之下第一部作品。^② 1888年继续完成《法兰克王朝》，过世当年出版的《墨洛温时代封地及辖区》是该系列的第三部著作，1891年遗稿出版的《日耳曼入侵以及帝国的结束》是他过世前亲自整理的最后一部作品。^③ 对古朗士而言，历史研究的对象是社会机构以及社会中人们的集体活动：包括法律的、经济的、物质与精神习俗等机构与活动。在他观念里，“历史学”与当时新潮的概念“社会学”没有差别，都是对制度及人群的研究。^④ 他在《墨洛温时代封地及辖区》导论里说：“历史是处理社会事实的科学，因此它就是社会学。”^⑤ 个人行为以及个别事件不是他关注所在。他曾说事件总是不易完整呈现，不如制度有多方史料可以将它重建并加以证实。

方法学上，古朗士在写作《古代城市》时，不看当代人有关古代城市的著作，只看第一手文献。他不希望后人所使用的方法及概念影响他对资料的理解，他要直驱源头，直接接触原始文献，以不带偏见及不预

^① 他古代城市研究的自述，参见他1862年史特拉斯堡大学的就职演讲“科学的史家之信念”。本文参考Fritz Stern的英译文“The Ethos of a scientific Historian”，Fritz Stern eds., *The Varieties of History, From Voltaire to the present*, Macmillan London, 1956, pp. 178–188。

^② 系列名称：*Histoire des Institutions Politiques de L'Ancienne France*。

^③ 古朗士系列中另两部遗作由Camille Jullian整理出版，分别有关封建起源以及加洛琳王朝。

^④ 古朗士是社会学开创人之一涂尔干(Émile Durkheim, 1858–1917)的老师。1877年入学，当年瑟诺博司毕业。

^⑤ Fustel de Coulanges, *L'Alleu et le domaine rural pendant l'époque mérovingienne*(《墨洛温时代封地及辖区》), Librairie Hachette, Paris, 1931, Introduction. 原文为：“L'histoire est la science des faits sociaux, c'est-à-dire la sociologie même.”

设立场纯然的心智仔细地推敲文献。^①《古代城市》杰出的成就正在于它的论述完全奠基于被前人所忽略的文献之上。多年后在《法兰克王朝》的序言里,他说:“在我所有研究中我一直实践着三十五年以来同样的方法。这方法包括三个规则:直接地研读文献到最细微的地步,也只读文献;只相信有证据显示的;最后,果决地把错误方法养成的现代观念从过去历史中去除掉。”^②伯尔在描写他的生平时,将他定位为法国十九世纪史学的精神导师(An Intellectual Leader),他说:古朗士开创了一切以文献为依归的新史学。^③

瑟诺博司在高等师范学院跟随古朗士四年,除了历史学研究对象与方法学之外,后者系统性思考方式以及怀疑精神对他有终身的影响。古朗士有“隐藏不住的追求系统的念头”,这是1869年普法战争前一年他还在史特拉斯堡大学任教时,教育督学给他的评语。非常巧合的是,1882年作为他的学生瑟诺博司的博士论文获得的评语也如出一辙。^④而在怀疑精神上,瑟氏更不只是承续古朗士,他在方法学上将它发挥到极致。他与古朗士一样,概念与用词非常明确,一切模糊的字汇都在怀疑及舍弃之列,隐喻、类比的词藻也为他终身所不取;不同的是,瑟氏从文献考证的怀疑精神进一步走向对所有社会科学怀疑的立场。^⑤

1877年瑟氏毕业后即前往德国游学。在1881年他的德国留学游记中多处表达接受历史主义强调发展与演化的倾向,这些信念融入了

① 知识论上他与兰克希望能在史料前自我消融,让文献自己讲话态度一样,甚至更坚信能够如此。

② 古朗士的原文:“Dans ces recherches, je suivrai la même méthode que j'ai pratiquée depuis trente-cinq ans. Elle se résume en ces trois règles: étudier directement et uniquement les textes dans le plus minime détail, ne croire que ce qu'ils démontrent, enfin écarter de l'histoire du passé les idées modernes qu'une fausse méthode y a portées.” In Preface, *La Monarchie Franque*, Paris, 1922, p. 2.

③ Pomerans译著,第244页。伯尔说古朗士掌握丰富的史料,并以无比选择史实的能力打破了传统假博学的传统。李璜也说他“代表写实派的历史学家”(上引文,第10页)。

④ Pomerans译著,第297页。他系统化的倾向也呈现在文献史料的分类上,伯伦汉曾指出他在*Introduction*中所做的文献系统分类是不必要的。伯伦汉在1903年《史学方法论》(*Lehrbuch der Historischen Methode und der Geschichtsphilosophie*,下文简称*Lehrbuch*)第三版修订版中开始引用及讨论瑟诺博司所著的*Introduction*。他同意瑟氏将人类行为做系统的分类,并藉以替史料归类,但他指出瑟氏自己也知道:人类行为可以无限地细分。因此伯氏建议历史研究者该有所取舍,并与相关学科合作(参见1903年版*Lehrbuch*,第510—515页)。同时,系统性的章节细目也呈现在瑟氏《历史学方法于社会科学之运用》(*La méthode historique appliquée aux documents des sciences sociales*, Paris Félix Alcan, 1901)书中,成为其特色之一。

⑤ 详见本文第二节。

他的世界观,注入了他从古朗士承袭的系统思考之中。在 1887 年发表于《哲学评论》一篇论文中,瑟氏从心理学角度剖析文献形成的心路历程。他强调文献记录者的心路历程在研究者对史实了解中占关键地位。^① 这样的学术立场背离了古朗士不看重个别事件的基本信念。更明显的,1897 年他在 *Introduction* 从方法学上具体地说明历史个别人物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② 综观而言,瑟氏 1880 年代以下的论文与专书显示:他从古朗士承袭的精准学术精神与他追随拉威瑟在历史教育上的投入,两者发生了冲撞。对现实社会中历史教育的关怀与对历史中人物活动的重视交织在一起,让他背离了古朗士无视历史中个别事件的态度,并采取了跟古朗士将知识与研究者的社会关怀截然分开的不同立场。^③ 瑟氏在两位老师之间塑造了他自己独特的史学思想。

在高等师范学院中另一位深刻影响瑟诺博司,而且长期在职业生涯中提拔他的是拉威瑟。如伯尔所述,拉威瑟具有组织与行政长才而非智性的导师,他比瑟氏年长十二岁,也是高等师范学院毕业生。年轻拉威瑟的才识被同学赫赫有名的父亲杜儒义(Victor Duruy, 1811 – 1894)所赏识。杜氏与当时复辟王室拿破仑三世家族关系密切,1863 年他以高等师范学院担任讲师时被任命为教育部长,所辖的不只是狭义教育的事,被称为超级部长。上任后,他聘任刚以最高等毕业文凭(agregation)毕业的拉威瑟为部长私人秘书,协助他推动教育改革的工作。^④ 杜氏推动各级教育机构的改革,他要将教育的决定权从天主教的掌控中夺取过来,完成教育国家化,以教育强化民族国家。在小学义务教育方面,他提高教师薪资及其社会地位,将历史与地理纳入课

^① Seignobos, "Conditions psychologiques de la connaissance en histoire"(《历史知识的心理学基础》), *Revue Philosophique*, 1887, p. 28. 他总结的说:“L'histoire est surtout une application de la psychologie.”(历史学是心理学的一个运用)瑟诺博司对一份文献产生过程中观察者细微的心路历程以及文字符号的意义做了非常详细的分析。历史文献隐含着大量的心理成分,研究者在进行史实真实性考证以及进行解释工作时必须面对这些心理现象。这篇 1887 年的论文可以视为是 1897 年普及方法学的 *Introduction* 的理论基础。

^② 参见 *Introduction* 第三卷第十四章通式的建构。

^③ 古朗士坚持:“爱国心是美德,历史学是科学,两者不可混淆。”("Patriotism is virtue and history is science, and two should not be confounded", 见上引 F. Stern 书, 第 178 页)

^④ 历史系通过这项考试毕业的获得头衔 *agréé d'histoire*。1874 至 1883 年凡十年间全国共有 95 人获得此头衔,1884 至 1893 年有 130 人获得此头衔,1894 至 1903 年有 137 位学生获得此头衔。

程。^① 中等学校也强化哲学、历史与地理的课程。高等教育相对应的改革是历史师资的培训。杜儒义创立高等实践研究院(École pratique des hautes études),以培训研究人员为目的,弥补一般大学教育中完全没有研究训练的缺陷。拉威瑟的国家教育理念受到杜氏的影响,而这些教育理念,尤其是以训练研究提升师资、培养国力的基本信念,也传递到瑟诺博司的思维中。

1870 年普法战争结束,法国皇室逊位,帝国改组为共和国,终止了拉威瑟彗星般的职业生涯。在另一位高等师范学院同学莫诺德(Gabriel Monod, 1844 – 1912)的建议下,他前往德国哥廷根大学由威次(Georg Waitz, 1813 – 1886)主持的历史系进修。在两年潜沉研究的基础上,1875 年他完成博士论文《普鲁士王朝的源始与布兰登王室的兴起》。^② 论文研究之目的在于探究普鲁士成功的根源,他说一个人若不了解一段事情的根源,就无法真正掌握该事。他的普鲁士研究不是为研究而研究,而是为了了解这个羞辱法国的敌人到底是怎样的一个新兴国家。拉威瑟对德国的历史教育充满嫉妒与敬意,在他后来重返教育改革工作时,期望法国能透过历史教育从灰烬中再度兴起,他不断以“打败德国人”来形容他努力推动历史教育改革的目标。^③

拉威瑟凭藉这篇带有强烈叙事情绪而又杰出的论文进入到高等师范学院担任讲师。他承续着德国兰克(Leopold von Ranke, 1795 – 1866)、德罗伊森(Johann Gustav Droysen, 1808 – 1884)以来写作的传统,在高等师范学院展开与古朗士迥异的教学风格;而瑟诺博司的历史写作也受到拉威瑟的影响,在严谨的文献基础上不乏对人物的激情叙述。1881 年拉威瑟又出版成名作《青年腓特烈大帝》,他从心理学的角度细腻描写腓特烈·威廉一世的个性。因为拉威瑟熟悉普鲁士历史以及他与政界紧密的关系,一度谣传他将接受派任驻德国大使。但拉威瑟强调他终身的志业是改革法国的历史教育,要让国民热爱法国。

^① 参见 Pomerans 译著,第 281—286 页,拉威瑟传。

^② *Étude sur l'une des origines de la monarchie prusienne ou la marche de Brandenbourg sous la dynastie ascanienne*, 1875.

^③ “combattre les allemands”(打败德国人)用词出自 Lavisse, “La Réforme du concours d'agrégation d'histoire”, *Revue universitaire*, 3, 1894. 本文引自 Pomerans 译著,第 217—218 页。

1903 年他被任命为高等师范学院院长,肩负推动历史教育改革的重任。在这之前拉威瑟就已经是巴黎学界最具影响力的领袖,任何人事案都必须经由他同意。

从 1874 年到 1877 年瑟诺博司就读于高等师范学院,后两年他跟随拉威瑟。1877 年瑟氏也以最高等毕业文凭完成学业,在老师们的推荐下获得前往德国哥廷根、莱比锡、柏林、波恩等大学的三年奖学金。在面对普鲁士德国大学历史教育时,瑟氏也有与老师们类似的复杂情绪。1881 年发表的游学报导《德国大学的历史教育》是他当时历史教育思想的记录。^① 这篇报导与十三年后 1894 年的大学历史教育改革之间有明显的一贯性,它们显示法国历史教育面对德国的嫉妒、羡慕情结与所做的抉择。1897 年 *Introduction* 中他对历史方法学的要求,落实了他德国游学报导中的思想。这篇报导与 *Introduction* 精神上紧密关联。

《德国大学的历史教育》(三十七页)报导分为八章:第一章教育的对象,第二章教授教师,第三章历史教育的位阶,第四章历史教育的形式,第五章辅助科学,第六章图书馆,第七章考试,第八章历史教育的一般性质。

第一章两页,说明来自文法中学的学生都有良好的古典语言学基础。除了大多数以担任中学教师为目标之外,与法国不同的是,有许多学生立志做研究。学生没有学业及毕业年限。第二章五页,说明德国教授的工作以研究为主,教学占其中较小的一部分,自由主义的政治倾向曾在 1848 年国会中有很大的影响。系里除了讲座教授,另有编制外教授、待业教授三类。每所大学阵容不一,柏林、莱比锡等大系有八位正教授担任讲座,其他波恩、哥廷根有四名正教授,格莱斯瓦德、弗莱堡仅有两位正教授。教授薪资不高,待业教授生活更为拮据,但是仍然有许多学生决定走研究的生涯。他说:“这岂不显示德国人对历史学无可

^① 瑟诺博司报导标题: L'Enseignement de l'histoire dans les Universités allemandes, 发表于年刊《教育学国际评论》(*Revue Internationale de L'enseignement*, 1881 年创刊于 Paris, 下文简称“年刊”), 第 563—600 页。

置疑的品味吗?”^①第三章历史教育的地位，在短短的两页中，他指出历史学成了德国所有学科的基础，德国历史学的思考方式提升了所有其他道德科学（人文科学）的质量，不论宗教、哲学、法政制度、语言、经济行为都必须放在发展的观点下来了解，他以肯定的口气说：“不知道曾经如何，就是对现状的无知。”^②瑟氏扼要掌握德国历史主义的中心思想，羡慕它渗透到整个生活成为普遍的文化现象。

第四章历史教育的形式，共十七页，几乎占全文一半的篇幅，报导德国大学中授课的情形。瑟氏提到德国大学中有演讲课与研究实作课（Seminar）两种授课方式。关于前者，文中完全没有说明，相反的，他聚焦于有播种意涵，而且将所有与课者视为对等研究者的研究实作课。他一一罗列所参与的各个德国大学研究实作课，并加以解说。时间的顺序显示 1877 年他到波恩大学上了诺登（Carl von Noorden, 1833 – 1883）的课，后追随他去莱比锡大学，显然瑟氏喜欢他的课。1877 年也是兰普瑞希特（Karl Lamprecht, 1856 – 1916）从哥廷根伯伦汉（E. Bernheim, 1850 – 1942）门下转到莱比锡以诺登为博士指导老师的一年，^③瑟氏此时在莱比锡与兰氏同一系并跟随同一位老师。他对莱比锡历史系的活泼及研究方向非常肯定，在这篇报导的最后总结中，他回顾所见所闻，预言莱比锡将会是德国史学未来的中心。^④ 在莱比锡大学，瑟氏也上了阿恩特（Wilhelm Arndt, 1838 – 1895）的研究实作课。阿恩特是威次的学生，他的课以日耳曼法中的豁免权为题，使用 Conrad 的法律条文及加洛林颁布的宪章为材料做考证的练习与材料的解释。1878 年瑟氏转往哥廷根大学，在那里参加了伯伦汉指导教授魏兹瑟克（Julius Weizsäcker, 1828 – 1889）一个学期有关中古时代城市联盟的研讨实作课。当时伯伦汉在系里担任待业教授，瑟氏在报导

^① 原文“n'est-ce pas une prevue irrécusable du goût des Allemands pour les sciences historiques?”（《年刊》，第 569 页）

^② 《年刊》，第 571 页。

^③ 另一位指导老师为著名的史经济学家 Wilhelm Roscher(1817 – 1894)。

^④ “普鲁士战胜后教授们又回到纯学术里，人们可以感受到一个改革运动展开了，莱比锡似乎是这运动的中心。”（“depuis la victoire de la Prusse, les professeurs sont rentrés dans la science pure, et l'on voit commencer un mouvement de réforme dont le centre paraît être Leipzig.” 见《年刊》，第 600 页）

里没有提及伯氏及其所开的课程,我们相信后来彼此在 *Introduction* 及 *Lehrbuch* 相互援引的两人,在此地初识。^① 之后,瑟氏去了柏林,参加了尼契(Karl Wilhelm Nitzsch, 1818 – 1880)的古罗马政治史实作课。

第五章以一页半的文字介绍德国大学中的古文书学。这是瑟诺博司骄傲之处,因为这项历史辅助科学是法国先开启的。早在法国大革命后,王室与贵族所拥有的私人档案面临丧失及损毁的威胁。1825 年第二帝国设立国家文献学院(Ecole de Chartes),培养古文书学、档案学、目录学专家,并将档案保存及管理国家化。瑟氏叙述德国学生吉克尔(Theodor Sickel, 1826 – 1908)在 1850 年代初从国家文献学院毕业,将所学带回德语地区,播下德国古文书学、证照学的种子。第六章图书馆,用一页篇幅赞誉德国大学图书馆有很好的藏书。他特别介绍了莱比锡大学和哥廷根大学历史系图书馆古文书学及证照学的书目。这些书目都是吉克尔将法国影响带回德国后的研究成果。第七章考试,以两页半篇幅介绍德国大学的两种考试:一个是大学替国家执行的中学教师检定考试,另一个是大学本身的博士考试。前者赋予通过的考生中学教师的职位,后者考生只获得头衔而无职位。瑟氏借德国的例子为法国提供一个他山之石。他的立场与其师拉威瑟一样,认为中学历史教师必须如德国一样具有历史研究的训练,而非仅仅记诵一般历史知识与熟习演讲术。1881 年他对德国历史教育的认识,最终落实在之后他的改革方案中。

最后第八章总评德国大学历史教育。瑟氏认为德国的历史教育走上训练学究之途,学生的训练机械而枯燥,僵化了思想,与现实脱节。历史原是政治与社会生活之母,现在这个资源完全被忽略了,历史知识支离破碎,没有像法国基佐(Guizot, 1787 – 1874)、英国麦考莱(Macaulay, 1800 – 1859)大文豪史家一样,将一个民族的身、心与血整合起来。^② 在课堂中学问扎实的德国教授一旦面向群众发表公开论述,其言论都有太多的政治玄思。瑟氏认为德国大学历史教育缺少考

^① 我们可以想象 27 岁精通法语的伯伦汉与 23 岁也精通德语的瑟诺博司的接触。两人往来正式见诸文字是:伯伦汉在 1889 年第一版《史学方法论》讨论历史学方法在各国的发展时提及瑟氏《德国大学的历史教育》,参见 1889 年版 *Lehrbuch*, 第 175 页。

^② 《年刊》,第 597—598 页。

证研究与政治玄思中间的部分,即一个综合性通史的写作训练。^① 他总结说,德国大学的历史教育虽然有这些值得批评之处,但还是羡慕德国的历史学。^②

这篇报导刊发表在高等教育协会发行的《国际教育年刊》创刊号。他的老师拉威瑟担任该协会的秘书长,实际推动整个教育改革协会的业务,包括这份历史教育改革号角的创刊。瑟氏以亲身的经历提供“先进的”德国的教育榜样,同时又展现批判的能力,他期望法国未来新的历史教育具有提升民主政治意识的力量,而这力量,他认为来自方法学上史料批判与综合叙述的训练。

瑟诺博司在游学报导中羡慕、嫉妒与自傲的情结是容易理解的。当时普法战争结束才十年,一般人也都认为战争不只是军事上的失败,它代表着法国在教育、知识方面智性的落后。^③ 事实上,德国与法国的大学教育在十九世纪存在着很大的差距,这项差距促使战后的法国开始挹注大量的经费展开教育革新。^④ 但是,即使到二十世纪初,双方在大学教育的数据上仍然显示着明显的差距。1903 年德国二十一所大学文学院共有 836 位正教授,而同时期法国十五所大学及高等教育机

^① 瑟诺博司指出德国历史教授所发表的政治言论与他们严谨的研究态度无关。对待学生时是以完全学究的态度,而对其他人的政治言论则失去任何准则。“la philologie pour les étudiants du séminaire, la politique à l'adresse des autres, et est donc le vrai caractère de l'enseignement historique des Universités。”(给研究实作课上的学生是语言学,给外人的是政治,这是大学历史教育的真性格),见《年刊》,第 599 页。瑟氏描写在研究与渲染的政论间史学家“有责任不糟糕地进行写作”。(余伟译本,第 188 页)

^② “et si nous n'avons pas épargné au système de l'enseignement historique dans les Universités allemandes des critiques qu'il nous semble mériter, nous savons trop ce qui nous manque pour ne pas reconnaître que, tout compte fait, nous avons encore beaucoup à envier à l'Allemagne。”(即使我们不留余地对德国大学历史教育多方面的批评——对我们有帮助的批评,但是我们也太清楚我们自己之所缺乏的,也不得不说,我们最后还是对德国有诸多的羡慕)这是以敌为师及他山之石交错的情结。伯尔强调瑟诺博司游学期间对德国历史教育负面印象,那仅是片面的描述(Pomerans 译著,第 295—296 页)。瑟氏以敌为师的情结协助我们解释他历史教育的改革方向,也协助说明 *Introduction* 的出现。

^③ 伯尔提出拿破仑在十九世纪初击败普鲁士激起普鲁士的改革,包括威廉·洪宝德的大学改革(Pomerans 译著,第 153 页)。

^④ Pim den Boer, “Vergleichende Historiographiegeschichte-einige Beobachtungen insbesondere zur Professionalisierung in Frankreich und Deutschland”, M. Middell eds., *Historische Institute im internationalen Vergleich*, Akademische Verlagsanstalt, 2001, pp. 135–148. 伯尔此文《比较史学德国与法国一些专业化的观察》,从制度、考试规则、知识面、期刊类别、专业人数等方面进行比较,以数据指出到二十世纪初法国仍然落后。但是历史学与地理合一的传统,让法国走向新的史学方向。